

傅佩荣译解

大學中庸

東方出版社

傅佩荣译解

大學中庸

東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傅佩荣译解大学中庸 / 傅佩荣 编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

ISBN 978 -7 -5060 -4448 -6

I. ①傅… II. ①傅… III. ①儒家 ②大学-研究 ③大学-研究 IV. ①B222. 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32199 号

傅佩荣译解大学中庸

(FU PEIRONG YIJIE DAXUE ZHONGYONG)

作 者：傅佩荣

责任编辑：王高婷 栗河冰

出 版：东方出版社

发 行：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100706

印 刷：三河市金泰源印装厂

版 次：2012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0 000 册

开 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9.25

字 数：120 千字

书 号：ISBN 978 -7 -5060 -4448 -6

定 价：25.00 元

发行电话：(010) 65210059 65210060

(010) 65210062 65210063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电话：(010) 65210012

出版说明

自从我出版《论语》与《孟子》的译解本之后，不断有读者询问：何时出版《大学》与《中庸》的译解本？我原先并未考虑这项计划，因为在我印象中《大学》材料太少，大家又习惯了朱熹的章句与批注，而《中庸》有些语句过于抽象，又高度概括，不容易说明白。

等到我具体进行这项计划时，才发现早就应该有人这么做了。朱熹的《大学章句集注》不但改编了《古本大学》的内容顺序，还为“格物致知”补上一段话，并且他对“格物致知”的看法难以自圆其说，以致后来王阳明在《大学问》中作了不少批判工作。但是王阳明的解说显然走向另一极端，使人读来亦觉不妥。

由于本书篇幅较少，并且为了方便读者检索，所以特地收录前面提到的两份文本。至于朱熹的《中庸章句集注》也以同样理由收于附录。本书《大学》部分所用的文本是《古本大学》，但并未忽略朱熹的“章句批注”本里面所有的重要观点，并且在批注中详加讨论。我的讨论引用不少《论语》与《孟子》的相关数据，目的是要彰显儒家思想的传承关系。先有《论语》和《孟子》，后有《大学》和《中庸》，这是历史事实，也是我们学习的次序。

傅佩荣

2012年4月

前言一 《大学》这本书

傅佩荣

《大学》原是《礼记》中的一篇短文，至南宋朱熹（1130—1200年）将其收于“四书”之中，与《论语》、《孟子》、《中庸》并列，它一跃成为儒家的重要经典。后来又因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明朝以来科举考试的主要材料，《大学》乃成为国人熟知的古代经典，其思想所造成的影响也普遍深入人心。

“大学”一词在古代原指高等教育机构，负责按照成为政治领袖所应具备的条件教导王公贵族的子弟。《大学》在阐述这些条件时，把握“修身”为其核心，要求政治人物以身作则，对百姓起“风动草偃”的效果，追求国家的安定与繁荣。这种观点符合孔子所倡言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因此，与其认为《大学》所代表的是夏商周三代共有的传统，不如肯定它是儒家思想的延伸与推广。正是为了这个缘故，朱熹将它列为儒家经典的“四书”之一，是合理的做法。

东汉郑玄（127—200年）首先为《大学》作注，他对《大学》的看法是“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这种观点稍嫌浮于表面。朱熹依北宋程颐（1033—1107年）之说，认为“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朱熹因而在编排“四书”的次序时，亦以《大学》为先。

程颐的看法与朱熹的做法值得商榷。首先，说《大学》是“初学入德之门”，尚可谓见仁见智；但是说它是“孔氏之遗书”，好像那是孔子本人留下的作品，或者退一步说，那是曾参纪录及传述孔子观点的作品，则不易取信于

人。其次，《大学》可以代表儒家思想的某种应用，但儒家学说的奠基者是孔子与孟子则殆无疑义。现在程颐主张“古人为学次第”（见于《大学》）而“论孟次之”。这明显是本末倒置的判断。我在译解本书时，尽量回溯它在《论语》与《孟子》中的文本依据，就是为了显示这一点。没有《论语》与《孟子》，哪来《大学》与《中庸》？

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中，在《大学》部分可谓煞费苦心。他改变《古本大学》的编排顺序，将其重编为“经一章，传十章”。“经一章”谈“三纲领”与“八条目”。三纲领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八条目包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由内而外一系列的学习、修养、实践及验证的过程。至于“传十章”，则是依“三纲领、八条目”的顺序，去重新编辑《大学》文本。由于这份文本并未谈到“格物致知”，于是朱熹再依程颐之意作了“补传”。这在我国经典的传承史上可谓创举。朱熹这种做法并不合适。关于古代经典，即使可能有刻错写错的字句，但我们后人连增减一字都须万分谨慎，何况是像朱熹一般擅自增加一百三十四个字呢？到了明朝，王阳明（1472—1528年）在发现朱熹所谓的“格物致知”无法自圆其说之后，依然以《古本大学》原有的内容来教授弟子，并且提出他个人的独到心得。朱熹与王阳明二人的观点各执一词，不可能都对，但可能各有所偏重。

今天读《大学》，焦点在于“修身”，尤其是修身之前的四个步骤：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这也正是朱王二人最大的分歧之处。我们在判断孰是孰非之时，还要设法提出一套合理的诠释。我的译文即代表我的理解，没有含糊其辞的空间；我的注解则着重于澄清概念，回溯孔孟原典，展现一贯之系统，尽量避免抽象或玄妙的术语，由此期望古代“大学”教育的理想再现于今日，成为我们共同寻求的学习目标与修养指南。

本书附录朱熹的《大学章句集注》及王阳明的《大学问》，便于读者查考之用。学术是天下之公器，我的译解本如果可以引发思考及讨论，进而使真理愈辩愈明，则可谓善尽其责了。

前言二 《中庸》这本书

傅佩荣

《中庸》与《大学》一样，原是《礼记》的一篇，经朱熹安排而选列“四书”之中，与《论语》、《孟子》齐名。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篇末提及“子思作中庸”一语。子思为孔子之孙，如果他真的写了《中庸》，是不是“四书”中的这一本呢？

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的《中庸》部分，一开始就引述程颐的话，说：“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矣，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仔细查考其内容，可知《中庸》分为三十三章，前二十章大量引述孔子之言，自二十一章起，朱熹认为是子思之言，而这一部分的文字多为论述体，其文笔与内容接近战国晚期的《易传》与《荀子》，而不可能出现于《孟子》之前。因此，《中庸》的某些思想也许出于子思或其学派的启发，但眼前这本《中庸》应非子思手笔，尤其在第二十八章有“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一语，所反映的是秦汉之际的实况。

无论《中庸》是何时或如何写成的，这本小书依然代表了儒家学说在先秦时代的发展与完成。

书名“中庸”，取义甚高，因为孔子在《论语·雍也》说过：“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这表示“中庸”是孔子之前早就存在的至高德行，而百姓长期以来很少能做到的。由于《中庸》第三章也引述孔子所说：“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因此，我们可以将《中庸》一书视为儒家重构此一至德的理论体系。

关于“中庸”一词的意义，可参考第六章描述舜的作为：“执其两端，用

其中于民。”以舜为儒家心目中至德的体现，实为不二人选。因此，“中庸”即是“用中”，是用中所造就的至德。若要用中，必须具备第二十章所说的“智仁勇”三达德。“用”字兼含智与勇，“中”字不离仁。仁的具体作为是善，落实于五达道中，亦即要圆满实现五种人际关系：“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交。”我们由此可以肯定儒家所谓的“善”是“一人与别人之间适当关系之实现”，而此一界说是理解“人之道”的契机所在。

第二十章有“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一语，接着又说“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因此，人之道即是“择善固执”。配合前面对“中庸”作为“用中”的分析，可以这样理解：“用”是择而固执，“中”是善。择为“智”，善为“仁”，固执为“勇”。自古以来，百姓很少能兼具“智仁勇”三达德的，因而难以实践“中庸”之至德。接着，这种观点的基础是什么？是人性的来源与归趋。

《中庸》开宗明义就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人性的来源是天命。“天命”一词在《尚书》中的用法是要求天子或诸侯“行善以照顾百姓”；到了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则成为每一个人都应体察的使命，要行善以完成人性。其次，“率性之谓道”是说：“人顺着这种本性去走的就是人生正途，亦即行善避恶。”配合前述以“人之道”为择善固执，可谓完全无误。然后，“修道之谓教”，则是修养自己走在人生的正路上，即是教化。

《中庸》第十六章开始出现“诚”字，然后从第二十一章至第二十六章，是儒家继孟子之后有关人生修养最深刻的论述。推而至于其他各章，进一步扩充人之道，抵达与天地造化相搭配的程度。其中有关“唯天下至诚”的描述，如第二十二章、第二十四章、第三十二章，皆让人读了目眩神迷，无法想象那是人类可以展现的境界。人性之伟大、美妙与神奇，至此臻于巅峰，可谓止于至善了。

我在译解本书时，大量引述《论语》与《孟子》的相关资料，并以《易传》的内容相互参照，希望借此凸显本书在儒家学说传承上的特殊地位。《大学》如果算是大学本科生的教材，《中庸》则是研究所的教材，其深度、广度与高度让人望洋兴叹，值得终身学习、实践及品味。

目 录

前言一 《大学》这本书	1
前言二 《中庸》这本书	3

大 学

第一章 大学之道.....	3
第二章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	5
第三章 物格而后知至	10
第四章 所谓诚其意者	12
第五章 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	19
第六章 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	21
第七章 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	22
第八章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	27

中 庸

第一章 天命之谓性	37
第二章 仲尼曰：君子中庸	40
第三章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	41
第四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	42
第五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43
第六章 子曰：舜其大知也与	44
第七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	45
第八章 子曰：回之为人也	46
第九章 子曰：天下国家可均也	47
第十章 子路问“强”	48

第十一章	子曰：素隐行怪	49
第十二章	君子之道，费而隐	51
第十三章	子曰：道不远人	53
第十四章	君子素其位而行	55
第十五章	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	57
第十六章	子曰：鬼神之为德	58
第十七章	子曰：舜其大孝也与	61
第十八章	子曰：无忧者，其惟文王乎	63
第十九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	64
第二十章	哀公问政	67
第二十一章	自诚明，谓之性	78
第二十二章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	80
第二十三章	其次致曲	81
第二十四章	至诚之道	82
第二十五章	诚者，自成也	83
第二十六章	故至诚无息	85
第二十七章	大哉！圣人之道	88
第二十八章	子曰：愚而好自用	90
第二十九章	王天下有三重焉	92
第三十章	仲尼祖述尧舜	95
第三十一章	唯天下至圣	96
第三十二章	唯天下至诚	98
第三十三章	诗曰：衣锦尚絅	99
附录一	大学章句集注	103
附录二	中庸章句集注	113
附录三	大学问	133

《大学》

第一章

大学^①之道^②，在明明德^③，在亲民^④，在止于至善^⑤。知止而后有定^⑥，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⑦有本末，事^⑧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⑨。

【译文】

大学的理想，是要彰显一个人光明的德行；是要他亲近爱护百姓；是要他抵达完美的目标。知道目标何在，就会引发确定的志向；有了确定的志向，才可能保持平静的心情；保持平静的心情，才可能安于所处的环境；安于所处的环境，才可能进行周全的思虑；进行周全的思虑，才可能领悟目标的价值。外物的存在有根本部分，也有末节部分；事件的发生有结束阶段，也有开始阶段。知道这一切的先后次序，就接近大学的理想了。

【注解】

①大学：“大学”是古代高等教育机构，培养贵族子弟从政所需的知识与能力。《大学》则是《礼记》中的一篇，从儒家立场说明大学的宗旨与理想。其中谈到修养的方法与成效，可以当做“初学入德之门”。就其所定目标看来，“大学”也可以称为“大人之学”。

②道：原指途径，引申为正途、规则、理想等。

③明明德：第一个“明”字，指彰显。然后，“明德”是光明的德行，表现为善的行为。“明德”一词在《书经》为常用之语，指称先王之明德，亦即君王对百姓的善行，参考《书·梓材》。大学教育的首要目标是要彰显一个人光明的德行。由此可知，人若未受大学教育，则未必彰显其明德。因此，学习与修养是必要的，是成己成人的第一步。大学即在教人明白此理。

④亲民：“明明德”的表现是善的行为，其重点在于自我修养。亲民则是就善行的效果而言。依儒家所说，“善”是一个人与别人之间适当关系之实现。因此，一个人行善，就会对“别人”产生正面影响，推而广之，即是亲近爱护百姓。从“明明德”到“亲民”，其间联系全在儒家对“善”的定义上。

⑤止于至善：“至善”可以就形式上说，指完美的目标。也可以就内涵上说，指完全安顿一切人际关系，亦即抵达世界大同的境界。孔子认为：“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论语·宪问》）由此可知，这是尧舜也觉得难以做到的事。

⑥知止而后有定：大学是教育机构，所以要由“知”入手；明白这些道理之后，再努力去“行”；修身实践到完美的程度，则是一生的事。“知止”是知道目标何在，然后才有“定、静、安、虑、得”这五个步骤。最后的“得”，依然是指领悟目标的价值而言。因此，前面的“知”是学习所知，后面的“得”才是自己的心得。孟子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孟子·离娄下》）求学未到“自得之”的阶段，很难引发实践的力量。

⑦物：原指万物，包括人与事在内。在此，“物”指与我相对及相关者。即使就万物而言，若非与我相关者，则我何从知之？为何知之？知之何益？因此，“物”除了我在仰观俯察所接触的自然界之外，主要皆就人与事而言。譬如，与人相处，须知各种人际关系及基本规范；遇到事件，则须懂得适当的处理方式。至于“物有本末”一词，则《大学》多次提及“本末”，如“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而一个人具体的角色或职务则是“末”。由此可见“物”的焦点在于“与我相关的人与事”。

⑧事：事指事件，在时间过程中出现及结束者。事因人而起，有人也才有所事。离开了人与事，万物只是依循固定规律、保持平衡生态，并处在流转生灭的过程中而已。

⑨由“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可知，《大学》依然以求“知”为主。至于“近道”，则表示真正的道（理想）还须付诸实践。

⑩大学有“三纲领八条目”之说，为南宋朱熹（1130—1200年）之见。三纲领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至于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则朱熹说：“言明明德、新民皆当止于至善之地而不迁。”（《大学章句》）如此一来，“止

于至善”兼指前二者而言，“三纲领”之说如何成立？王阳明（1472—1528年）则说：“至善也者，心之本体也。……复其本体，是之谓止至善。”（《大学古本序》）他又说：“故止于至善以亲民而明其明德，是之谓大人之学。”（《大学问》）依他所云，这三纲领其实是同一件事。

第二章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①，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②。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③。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④。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⑤。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⑥。致知在格物。

【译文】

古代的人，想要在天下彰显他光明的德行，就须先治理自己的国家。想要治理自己的国家，就须先规范自己的家庭。想要规范自己的家庭，就须先修养自己的言行。想要修养自己的言行，就须先端正自己的心思。想要端正自己的心思，就须先真诚面对自己的意念。想要真诚面对自己的意念，就须先推究自己所知的善。推究自己所知的善，就是要辨别外物与我的关系。

【注解】

①大学的理想是造就杰出的统治阶层，所以用“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作为示范。“古”常指古代的盛世，代表人物是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等圣王。他们面对天下百姓，这时“明明德”无异于“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妥善照顾天下百姓。

②由天下回溯到国，由国再回溯到家。古代“天子有天下，诸侯有国，大夫有家”，都属于统治阶层。由于一个人是大夫则不是诸侯；是诸侯则不是天子。这三者的先后承续关系是虚拟的，目的是要强调由小至大，由近及远的修

行效果。在今日看来，“家”可以指一个人的家庭；“国”可以指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工作单位或特定团体；“天下”则可以指某一工作领域，或某一具体的国家，或甚至全人类的范围。

③修身：“身”指言行而言。人有身体，从具体的洒扫、应对、进退，到动静、周旋，所言所行都要合乎礼仪、礼节与礼貌。孔子常以言行并举，如“言忠信，行笃敬”（《论语·卫灵公》）；“言中伦，行中虑”（《论语·微子》），“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易经·系辞传上》也说：“言行，君子之枢机。……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者，可不慎乎？”因此，修身即是修养言行。言行是表现于外者，其基础则在于内心的修炼，依序可以再回溯到：正心、诚意、致知、格物。

④正心：“心”是意识能力，可以对外认识，也可以对内自觉。孔子认为心是“出入无时，莫知其乡”（《孟子·告子上》），难以预测其来去及方向，因此“心”常在浮动的状态。孔门弟子之中，只有颜渊可以做到“其心三月不违仁”（《论语·雍也》），他的心在较长时间不背离仁，别的学生就无能为力了。孟子则认为，向人学习或请教，其目的只在把失去的心找回来，所谓“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心可能失去，所以需要存养，孟子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下》），寡欲为修身之事，养心则是为了正心。由此可知，只要正心，则修身有了基础并且易有成效。反之，心思若不端正，则言行难以符合规范的要求。那么，如何才能正心呢？

⑤诚意：若要正心，先需诚意。“心”指心思，已有具体内容，准备表现为言行，是由内到外的联结点。“意”指意念，为纯属内心之事，常常只是在某种处境中偶发的、直接的念头，有时一闪而逝，有时徘徊不去。所谓“诚意”，是指真诚面对自己的意念。“诚”字作为“真诚”，在《论语》中未见。孔子谈到有关真诚处世或待人时，常用“直”或“忠”二字。“直”有“真诚而正直”之意，如：“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论语·雍也》）“孰谓微生高直？”（《论语·公冶长》）“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论语·阳货》）其次，“忠”有真诚尽心之意，如“忠焉，能勿诲乎？”（《论语·宪问》）“忠告而善道之。”（《论语·颜渊》）“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论语·公冶长》）

到了孟子，“诚”字作为“真诚”，成为重要概念。如“思诚者，人之道”（《孟子·离娄上》），“诚身有道”（《孟子·离娄上》），“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然后，《中庸》从第十六章起关于“诚”的阐述更是淋漓尽致。在此暂不申述。

回到“诚意”一语。朱熹说：“诚，实也。意者，心之所发也。”人心一运作，就产生意念；所谓“核实或落实这样的意念”就是自问“我内心真的这么想吗？”所以稍后会谈到“自慊”（对自己满意）与不自欺（不欺瞒自己）。我们的问题在于：这种核实或落实并不保证其必然为“善”，那么又要如何由诚意而正心呢？诚意以“致知”为先决条件，因此除非朱熹肯定“致知”是推究有关“善”的知识，否则难以回答上述问题。但是，朱熹所谓的“致知”是指“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大学章句》）这种知为“物理”之知，非关善恶，所以他终究无法自圆其说。

其次，王阳明认为，“心之本体本无不正，自其意念发动而后有不正”，亦即，“意之所发，有善有恶。”所谓诚意，是以良知所知之善恶来检验“意之所在之物”的善恶，再努力为善去恶。我们的问题在于：王阳明认为对于善恶，“吾心之良知，无有不自知者”（《大学问》）。如此难免形成每一个人“过度主观”的现象，而大学所谓的教育也显得不太需要了。

⑥致知：《大学》在前三段出现与“知”有关的词最多，如“知止”、“知所先后”、“致其知”、“致知”、“知至”、“知本”、“知之至”。这表示《大学》确实是教人明白道理的书。以“致知”来说，必须说明“所知的”是什么，人不可能有知而无所知。

依朱熹所云，“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他认为《大学古本》在《传之五章》有所缺漏，少了“格物致知”的一段。于是他依程颐（1033–1107年）之意增补了这段话。他声称：“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大学章句》）如果朱熹所言为真，则古代读“大学”的人，有谁能合乎“格物致知”的标准？有谁能抵达“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这种程度？达不到这一步，则后续的“诚意、